

杜甫与岭南的“未竟之缘”

□ 陈桥生

杜甫终其一生未曾踏足岭南，却在晚年漂泊潇湘的生命最后阶段，对岭南产生了持续而深切的精神向往与现实期盼。本文立足于杜甫晚年行踪与心态，梳理其与赴岭南任职官员的交游赠答、对岭南历史人物的反复吟咏，以及南下避乱的行动轨迹，论证杜甫晚年明确有志南海之游，最终因一场大雨阻隔而未能成行。追寻这一“未竟之缘”，对于考察聚讼千年的杜甫卒葬之谜，或可获得新的理解角度，同时也为岭南文学史填补一段意味深长的“空白”。

壹

大历三年(768)正月，杜甫自夔州出峡，漂泊江陵、公安，年底抵达岳阳。此后两年多，他辗转于潭州(今长沙)、衡州(今衡阳)、郴州之间，生活困顿，疾病缠身。这段被称为“潇湘时期”的晚年，实则是他一生中最为困难的阶段。

安史乱平后，杜甫始终怀有北归之志。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所谓“即从巴峡穿巫峡，便下襄阳向洛阳”，正是其心迹所在。但晚年至潇湘，却不得不“更南征”。其诗中“图南”与“怀北”反复交织：“老病南征日，君恩北望心”，正是这种复杂心境的集中写照。

贫病中的杜甫，几乎是“哪里可得接济，便往哪里去”，不断追随故旧亲友，辗转流离。也正因此，随着越来越多故交官员赴任岭南，岭南逐渐进入了他的视野。

有唐一代，岭南虽仍被视作贬谪之地，其地缘地位却随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而显著提升。唐代经济重心向南海转移，岭南在王朝经济版图中的地位日益凸显，时人言岭南称“雄藩”“巨镇”，朝廷选帅“常重于他镇”。越来越多中原士人主动南来，岭南逐渐摆脱“畏途”形象，从流徙之地转变为士人建功立业的新空间。对于晚年的杜甫而言，它既是一条现实的逃难之路，也是一条寄托遐想的诗意之路。

贰

杜甫辗转于潇湘一带，却与经此前往岭南的多位官员有直接交往，或送

行，或酬唱，或寄诗，直白表达援引之盼。这些往来，成为他南游意愿最直接的外在表现。

大历四年，京兆尹李勉出任广州刺史、充岭南节度使。治广期间，李勉平定冯崇道、朱济时叛乱，又以清正廉洁，恢复了一度衰落的广州水陆贸易。史书评价其治绩可与前朝宋璟、卢奂、李朝隐相媲美。

李勉南行赴任，途经湘水，其时杜甫正在衡州，有诗《衡州送李大夫七丈勉赴广州》：

斧钺下青冥，楼船过洞庭。北风随爽气，南斗避文星。日月笼中鸟，乾坤水上萍。王孙丈人行，垂老见飘零。

斧钺征伐自天而下，楼船浩荡洞庭而南，见出李勉此行的“叱咤风云，指挥天地气象”，亦见出自身“垂老见飘零”的穷困潦倒。既是“笼中鸟”，那还有没有放飞的可能？既是“水上萍”，那又何时可能结束这样的飘零？由此不免触发杜甫对岭南的更多想象与期待。《杜臆》评此诗曰：“王孙乃我丈人行，忍见其若此耶？盖望之援手矣。”

杜诗题为送别，实则期盼李勉顾念长辈情谊，为自己提供接济与庇护。岭南自此从遥远的地理概念，变成或可依托的希望之地。此后，杜甫多次在诗中提及李勉，将其视为岭南的核心依托。

同年夏秋，韦迢赴韶州刺史任，途经潭州探望杜甫。韦迢赴任的韶州，正是入粤门户。二人酬唱往返，《酬韦韶州见寄》中“虽无南过雁，看取北来鱼”，已流露出杜甫希望借岭南故人维系声息的心态。

学者胡可先考证，杜甫与韦迢的交往，甚至影响到四十余年后元稹为杜甫撰写墓系铭之事。倘若这场交往，或许便没有元稹这篇引发“李杜优劣论”的名文。

大历五年(770)，杜甫重表侄王晌以评事身份，奉命赴岭南节度使李勉府中公干。临别，杜甫作长达四十余韵的《送重表侄王晌评事使南海》。诗歌开篇用大段笔墨追叙二人在安史之乱中的患难之情。天宝十五载(756)逃难途中，王晌曾在乱离中返身寻回失散的杜甫，并一路相护同行。诗中继而赞颂李

勉治理岭南的功绩：“番禺亲贤领，筹运神功操。大夫出卢宋，宝贝休脂膏。洞主降接武，海胡舶千艘”，写出岭南的繁荣与安定。最后直白抒发南游之心：

我欲就开砂，跋涉觉身劳。安能陷粪土，有志乘鲸鳌。或跃或飞龙，聊作鹤鸣皋。

仇兆鳌注曰：“此公有志南海之游也。”这几乎是杜甫晚年最明确的“南游宣言”。

大历五年春，杜甫舅氏崔伟往摄郴州刺史，杜甫有诗《奉送二十三舅录事之摄郴州》相赠。开篇叹穷老乱离，陈诉甚悲。“永嘉多北至，勾漏且南征”，乱世流离，衣冠南渡，葛洪南征，如今舅氏也要往摄郴州。“郴州颇凉冷，橘井尚凄清。”既望其保重，又勉其居官尽职。

同年四月，臧玠在潭州作乱，杜甫携家复自潭州往衡州，又有意往郴州南投崔伟。途中作《入衡州》，铺叙此逃难经历，未章曰：

橘井旧地宅，仙山引舟航。此行厌暑雨，厥土颇清凉。诸舅割符近，开缄书札光。频繁命屡及，磊落字百行。江总外家养，谢安乘兴长。

崔伟屡屡书札相招，杜甫遂有意南投郴州避乱。此情此景，正与当年避乱南下广州依附舅氏的江总何其相似。郴州在诗中已不再是偏远荒凉之地，而成为可以托身栖居的“清凉”之境。与此同时，好友苏涣亦最终南下投奔李勉，更强化了杜甫对于岭南的现实想象。

杜甫潇湘诗作中，葛洪、许靖、江总等与岭南相关的人物故实屡屡出现，绝非偶然。他们既是乱世南迁的先行者，也成为漂泊中的杜甫反复追想的精神参照。葛洪晚年求为勾漏令，至广州为刺史邓岳所留，止于罗浮山炼丹。许靖在汉末避乱，流宕交州十余年，得交趾太守士燮厚待。二人都成为杜甫心中“避世常此路”的榜样。《咏怀二首》其二云：

飘飘桂水游，张望苍梧暮。……未辞炎瘴毒，摆落跋涉惧。虎狼窥中原，焉得所历住。葛洪及许靖，避世常此路。贤诚等差，自合受驰驱。……终当挂帆席，天意难告诉。南为祝融客，勉强亲杖屦。结托老人星，罗浮展裘步。

诗中“桂水”“苍梧”“罗浮”等意象，皆指向岭南空间；而“葛洪及许靖，避世常此路”，更直接将南赴岭南视作乱世避世之途。

被多数研究者视为杜甫绝笔的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》，末尾又云：“葛洪尸定解，许靖力难任。家事丹砂诀，无成涕作霖。”诗中仍以葛洪、许靖自况，流露出欲效前人南赴岭南而终究“力难任”的沉重遗憾。

这些先贤共同构成杜甫的岭南认知：岭南并非蛮荒之地，而是乱世中文人可以存身、可以安心、可以成就自我的理想之地。这种精神层面的认同，与生存层面的需求相互交织，使岭南成为杜甫晚年最后的希望。

叁

大历五年夏，杜甫携家乘船自衡州溯耒水而上，直奔郴州投奔崔伟。行至耒阳境内方田驿，遭遇连日暴雨，江水暴涨，船只被阻五日，断粮挨饿，陷入绝境。

方田驿是唐代通往梅岭、进入两广的官方驿站，是湘粤交通之咽喉。此时，杜甫距离郴州仅百余里，可这场大水彻底阻断了他的前路。耒阳县令聂某得知后，派人送来酒肉，杜甫作长诗致谢，即《聂耒阳以仆阻水，书致酒肉，疗饥荒江，诗得代怀，兴尽本韵，至县呈聂令，陆路去方田驿四十里，舟行一日，时属江涨，泊于方田》。诗中称聂令为“义士烈女家”，感激其危难中的慷慨。

然而，此后的行踪却成为杜甫生平中最大的谜团。他究竟是继续南下往郴州，还是折返北归？卒葬于耒阳，还是岳阳？聚讼千年，莫衷一是。

至上世纪末，争议波澜再起。傅光《杜甫研究(辛葬卷)》以三十五万字的篇幅，全面论述了杜甫的卒葬问题，结论是杜甫于大历五年夏卒于耒阳。其后，莫砺锋《重论杜甫卒于大历五年冬——与傅光先生商榷》等，反驳了傅光的意见，坚持杜甫卒于大历五年冬。李定广《杜甫大历五年夏卒葬耒阳考实》文，依据唐五代至宋初人祭拜杜甫墓者全在耒阳，绝无无一诗一文涉及岳阳；北宋至明代人均曾为核实杜甫墓而进行

过实地考察，也证实唐宋元明四朝岳阳无杜甫墓，杜甫大历五年夏五月卒葬耒阳是事实。

若考之于杜甫在湖湘间的行踪心迹，笔者倾向于其最终卒于耒阳之说。其一，方田驿离郴州已不远，崔伟又以书札频招，仅因一场大水便放弃，不合常理。况且，若折返北归，潭州一带带带之乱未平，“公孙仍恃险，侯景未生擒”，难道不比暴涨的江水更为凶险吗？

其二，杜甫与苏涣一同避乱南行，二人惺惺相惜。在《入衡州》诗中，杜甫以剧孟、白起比苏涣，极力为其举荐。苏涣最终走交广投李勉而去，若杜甫本人因一场大雨就彻底放弃南行，与苏涣的默契和彼此期许便难以解释。

其三，杜甫绝笔诗的结尾依然念念不忘“葛洪尸定解，许靖力难任”，更像是南行未遂的临终追悔。若他已折返北行多时，情绪焦点应更多放在北归无望或家事上，而非反复纠缠于岭南故实。

从杜甫一生行踪来看，他终究无缘踏入岭南的地域。但观其潇湘之作，岭南的时局变化、风物人心，时时盘桓于诗人心中。他一定在心底细细地盘算过前往岭南的种种可能。心中一次次燃起的小火苗，在湘江之上，在扁舟之中，扑闪，摇曳，最终在一场大雨中被彻底浇灭。带着“许靖力难任”的遗憾，他将生命的脚步停止于湘粤之际的五岭之麓。

结语

历史没有如果，遗憾本身亦是历史的一种形态。彼时，大庾岭路已经贯通，唐王朝的经济与文化重心亦正渐次南移。杜甫最终没有越过五岭，但在其潇湘晚年的诗歌中，岭南早已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“南方”，而成为乱世中可以托身、寄志、安顿生命的精神彼岸。

某种意义上，杜甫的“未至岭南”，恰恰构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段意味深长的空白：诗人最终止步于湘粤之间，而文化与历史的潮流，却正在越过五岭，渐次南移。杜甫的岭南“未竟之缘”，也因此成为唐代文学与岭南文化关系中，一个极富象征意味的历史瞬间。(作者系羊城晚报社高级编辑)

“过番”与“回唐山”： 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中的潮汕侨乡精神

□ 林伦伦

在潮汕侨乡，过去很多人家最盼望听到的一句话，是：“阿姆，批来了。”

一声“批来了”，意味着远在“番畔”的亲人有了消息，也意味着一家老小这个月的生计有了着落。送批阿叔骑着自行车穿街过巷，把南洋寄回来的银信送到侨眷家中。拆开“番批”，往往寄的是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的养家钱，还有几句半文半白的话语：“儿在外一切尚可，勿念。”

对于潮汕人而言，这是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记忆。

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之所以打动无数观众，原因也正在这里。它表面上展现的是一场漫长的等待与守望，实际上写的却是整个潮汕侨乡社会数百年来的情感经验：有人漂洋过海，有人在故乡守家；有人在南洋谋生，有人在故土等待；有人一生都在“过番”，有人一生都在等“回唐山”。

因此，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真正动人的地方，是它拍出了中国人尤其是潮汕人精神世界中一种极深的善良与情义。



侨批(汕头侨批文物馆)

图片来自《根深叶茂：原乡异乡两地情》，林伦伦、[马来西亚]陈再藩著，花城出版社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上映后票房与口碑双双丰收。这部仅投资1400万元的小成本电影，不仅在广东大热，也在北京、上海等地引发广泛共鸣。其成功原因很多，而最重要的，是它反映了中国人的善良和情义秉性。在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上，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点赞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，称其“于平凡当中书写了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情义、担当，唤起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、文化认同”。

今天我们谈论影片，需要先知道其背后的一个历史背景，那就是潮汕侨乡文化。潮汕是中国著名侨乡，本土约有1500万人口，而在海外也约有1500万的乡亲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“海内一个潮汕，海外一个潮汕”。

但“侨乡”二字背后，其实是一部漫长的迁徙史。

潮汕人的祖先，是从中原经过江浙下福建，又从福建西迁到粤东的移民。经过从汉魏六朝到明清近两千年的播迁，其所携带的中原文化不断与迁移新地的文化交融、变化、发展，到最后在粤东停下脚步，又经过数百年与闽粤、南越土著文化的融汇，创造出了既保留传统中原文化又融合了土著文化、海洋文化的丰富多彩潮汕文化。

然而，“停下脚步”并不意味着漂泊结束。

明清以后，随着福建移民不断进入，粤东人口迅速增长，人多地少。如果再遇灾荒，粮食就不够吃了。怎么办？对有移民传统和迁徙经验的潮州人来说，那就继续迁徙。潮汕民间有一句老话：“食到无，背起衫包过暹罗。”有人出门时，在市篮里放一块坭粿(糯米年糕)、一包故乡泥土，披着方格水布，登上红头船，就“下南洋”去了。那另一片土地，不是中国的，而是异国他乡，是“番畔”。于是，就有了“过番”，有了“番客”，有了“番客”寄回家乡的银信——“番批”(侨批)，有了“番客”回唐(回家乡)。

潮人把祖国称为“唐山”，把回故乡叫作“回唐山”，这个“回”字，包含极深的文化意味。因为，对于许多潮人来说，故乡从来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，更是精神之根、文化之根。因此，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真正深处的悲欢，也就在这里：它写的不是一个人的等待，而是一个整个侨乡社会漫长的离散与守望。

影片编导蓝鸿春是汕头潮阳人，长期浸润于潮汕文化。近十年来，他先后拍摄潮汕方言电影《爸，我一定行》《带你去见我妈》《给阿嬷的情书》，以及纪录片《四海潮味》，采访了300多个海外

潮籍华人家庭。那些漂泊异乡却始终惦念故土与亲人的潮人故事，深深影响了他，也使《给阿嬷的情书》具有浓厚的侨乡历史感。

电影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，则是侨批这条主线。侨批是潮汕人和潮籍海外乡亲的集体记忆，2013年，“侨批档案”入选《世界记忆名录》，成为广东省第一个世界记忆遗产项目。《给阿嬷的情书》通过郑木生和潮南枝接力20多年写给叶淑柔的一封信(侨批)和叶淑柔的回批展开叙事。这些“番批”多由“写批先生”按口述写成，带有旧式尺牍文体的味道，半文半白，还夹杂一些潮州话词语，读来十分文雅。

但侨批的真正珍贵之处，并非“情书”，而在于背后所维系的一整套伦理关系和信用体系。在潮汕侨乡，几乎家家户户都是侨眷，一声“阿姆，批来了”，就意味着“番畔”的救命钱来了，也意味着一家老小这个月的生计有了着落。送批阿叔就是潮汕侨眷家庭的“吉祥喜鹊”。

很多时候，“水客”带着侨胞托付的钱款与口信回乡，不必立字据，也不怕被吞没。乡人之间相信“信用”二字重于一切。香港著名金融家庄世平先生曾说：“侨批的历史雄辩地说明了潮汕人恪守信用的优良传统。可以说，没有

信用就没有侨批。”

侨批是一种通信方式，更是一种情义契约，维系着家庭责任、亲族伦理与文化认同。一个漂泊南洋的潮州男人，也正是通过一封封侨批，继续维持着自己作为“家里人”的身份。

在中国人的观念里，“家”不只是居所，更是责任共同体。哪怕远隔重洋，“过番”南洋的潮州人，依然牵挂父母妻儿。侨批寄回的，也不仅是钱款，更是一种“我仍是家中一员”的伦理确认。因此，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真正动人的，不只是爱情，而是它重新唤起了中国人重家庭、守信用、念故乡、讲担当的情义传统。

影片成功的第三个原因是满满的潮汕民俗风情元素。在5月19日晚的北京大学百年讲堂观影后的座谈会上，主持人问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、潮州人陈平原：“电影里有什么潮汕文化的元素？”陈平原教授回答说：“从头到尾都是。”

其中，叶淑柔扛红旗的场景颇为典型。郑木生因为叶淑柔漂亮而追着标旗队看，一不小心掉进池塘里。潮汕观众都会心一笑。扛标旗巡游是潮汕村寨常见民俗。每逢时年八节，游神赛会期间除了潮州大锣鼓、潮州音乐巡游表演之外，还有女子扛标旗或者挑花篮巡游。扛标旗的姑娘，通常都是村里百里挑一的姑娘，尤其是“头标”(走在最前面的扛标旗姑娘)，常被默认为“一号美女”。

陈平原教授曾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《扛标旗的少女》一文，对此有过精彩的文学描写。电影通过“看标旗”“追着落水”等细节，既写出了叶淑柔的美貌，也写出了她后来的韧性与坚守，塑造出一个秀外慧中、善良柔韧的典型潮汕侨乡女性形象。

事实上，电影中的这些民俗细节，并不只是“地方风情”的点缀。潮汕民俗之所以繁盛，与侨乡社会长期形成的族群凝聚力密切相关。海外潮人到了东南亚后，也往往会修建庙宇、成立潮州会馆、宗亲组织。大家一起“营老爷”、演潮剧、喝工夫茶、说潮州话，以此维系共同体认同。

乡亲们常说：“哪里有潮水，哪里就有潮人。”我还增加了两句：“哪里有潮人，哪里就有潮语；哪里有潮语，哪里就有潮汕文化。”

于是说到影片成功的第四个方面，潮汕方言的运用。《给阿嬷的情书》大量使用潮汕话对白、潮汕歌曲和潮汕侨批朗读，演员口音也保留了不同地区的自然差异，真实而亲切。我原本担心方言会影响传播，但事实证明，真挚的故事足以跨越语言隔阂，不少非潮汕观众同样深受感动。祖籍宁夏的深圳报业集团青年记者马小晗看完电影后，在我的朋友圈中留言说：“电影太感人了！现在最缺的就是像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一样真诚走心的故事啦。”

潮汕方言对于潮人来说，不仅仅是一种交流工具，更是一种文化认同的标志。潮汕方言就是潮人的“有声Logo”。不管潮人的足迹去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，它让我们知道，我们是从什么地方出发的，知道我们的根在哪里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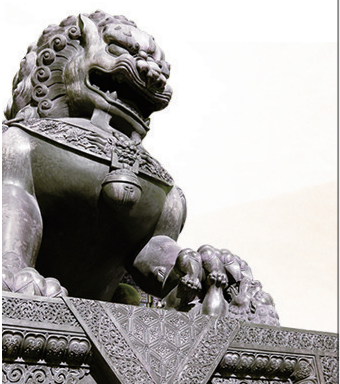
语言学里有一种现象：离散族群往往比家乡社会更重视母语保存。对于遍布东南亚的潮人而言，潮州话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，更是一种确认“我们是谁”的文化标识。因此，潮州会馆里讲潮州话，潮剧用潮州话演出，“营老爷”用潮州话唱赞，甚至侨批也往往保留着潮州方言词汇。方言背后所维系的，其实是一套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。

最后，一些看起来不经意出现的潮汕小物件，如青橄榄、油甘、乌橄榄菜、无米粿等，也使电影的潮汕文化元素更加饱满。青橄榄入口先苦后甘，颇有潮汕人生活哲学的意味，也隐喻着许多潮人漂泊奋斗的人生经验。

所以，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之所以能够走出潮汕，感动全国，并不只是因为潮州话、英歌舞、无米粿这些地域元素，更因为它讲出了中国人共同的情感伦理：念亲人、守承诺、重情义、恋故乡。

侨批不只是一封旧信，“过番”也不是一段旧闻。它们背后，是无数普通中国人在漂泊中的家国情感与归属感。某种意义上，电影所讲的，不只是潮汕侨乡的故事，也是近代以来无数中国人漂泊、离散与归根经验的一种缩影。

它所归属的，是中国人内心深处那个始终未曾改变的精神世界：无论漂泊多远，我们始终要——“回唐山”。(作者系广东技术师范大学二级教授，当代著名方言学家、文化学者，国际潮学研究会执行会长)



羊城晚报

A10

理论

文史哲

2026年5月29日

星期五

责编 潘玮倩

美编 张江

校对 马曼婷